



# 体媒人物

——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口述史

(下)

薛文婷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 体媒人物

——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口述史

(下)

薛雯婷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媒人物: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口述史.下/薛文婷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302-40345-6

I. ①体… II. ①薛… III. ①体育—新闻事业史—史料—中国 IV. ①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4436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40mm 印 张:22 字 数:405千字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

产品编号:064701-01

# 目 录

## 上 册

### 通讯社篇

- 官天一：我拍了一辈子的体育照片……………3
- 李贺普：朋友们开玩笑说，首席记者来了……………15
- 高殿民：一辈子都献给了中国的体育报道事业……………29
- 杨 明：我绝对是中国第一田径记者……………47
- 许基仁：打造一支敬业、专业、职业的体育报道队伍……………63
- 徐济成：既“开车”也“造车”的乐趣……………79
- 周 杰：我对冬季奥运会情有独钟……………95
- 苏祥新：我是一个以撰稿为生的人……………107
- 夏宇华：在体育新闻制高点上努力发出中新社的声音……………119

### 体育专业报刊篇

- 郝克强：《新体育》是新中国体育传媒的头一份儿……………131
- 鲁 光：记者、作家、画家，三个角色都不可或缺……………143
- 涂晓东：打造最有影响力、竞争力的体育文化传媒基地……………159
- 张乐年：我是一个编者、记者、思者……………171
- 夏 娃：跑乒乓球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183
- 严俊君：我自己打败自己……………197
- 刘晓新：《足球》报的关键词是“足球”……………213
- 苏 群：你可以打碎鸡蛋，但不能说假话……………227
- 白金贵：做永远的第一线体育记者……………243

李焯晖：和《体坛周报》一起成长·····	257
周文渊：我们这批人正好赶上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271
马德兴：我习惯一个人单兵作战·····	287
李响：我见证了中国足球最辉煌的时代·····	305

## 综合性报刊篇

汪大昭：这30年，我无怨无悔·····	321
罗京生：赶上了中国纸质媒体体育记者的黄金20年·····	335
毕熙东：何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349
袁虹衡：光荣属于我的职业·····	365
姬宇阳：好记者和好评论员并不矛盾·····	379

# 下 册

## 广播篇

陈文清：为体育广播工作一辈子·····	3
陈建奇：体育广播的发展是有前途的·····	19
梁悦：体育报道曾引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先河·····	31
梁言：我想做一个最好的体育节目主持人·····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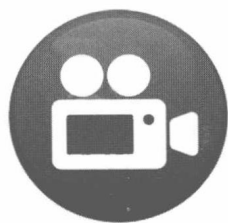
## 电视篇

王兴华：看到后辈的发展感到很高兴·····	61
哈国英：电视体育转播是我快乐和幸福的来源·····	69
孙正平：我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专职体育播音员·····	83
师旭平：着眼于人的故事·····	99
马国力：我希望能有第二个体育频道·····	115
程志明：我是中国奥运电视公用信号制作领航员·····	133
辛少英：想开创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民健身性质的娱乐节目·····	149

张 斌：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 .....	165
张 虹：电视是挺迷人的一个行当 .....	183
罗宏涛：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只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 .....	197
刘建宏：足球是一个可以干到死的职业 .....	211
房学峰：我像是民间知识分子 .....	225
焦少波：和中央电视台进行差异化竞争 .....	237
王泰兴：我就是个播音员 .....	253
金宝成：扎扎实实地攀登，安安静静地思索 .....	267
卢晓峰：我们引进了英国足总杯 .....	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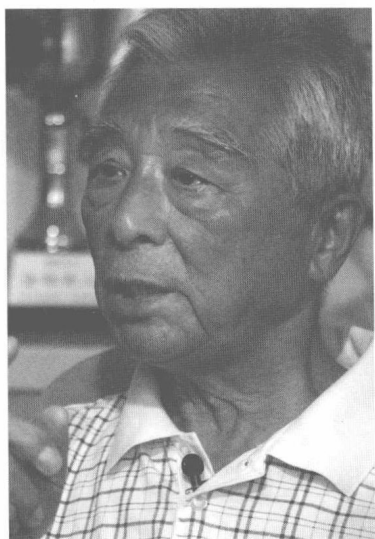
## 新媒体篇

王永治：希望把腾讯体育做到业内最好 .....	293
颜 强：我比较熟悉的领域是英超 .....	307
董 路：我跨界跨得有点猛 .....	321
<b>后记 .....</b>	<b>335</b>



# 广播篇

# 陈文清



陈文清，高级记者。1934年生于辽宁大连。1947年进入汽车修理厂当学徒。1948年进入沈阳麻袋厂，先后当过工人、工段长、厂工会专职宣传委员。1959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63年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部体育组任记者。1994年退休，被返聘。2002年离开工作岗位。2006年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获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金奖（2009）。



# 为体育广播工作一辈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是国人获取体育信息的重要渠道，在新中国体育新闻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报道的早期四人组成员之一，陈文清在体育广播领域工作了近40年，见证和亲历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专题节目、赛事实况转播、体育新闻报道和体育部门的发展变迁。

## 一、我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

生逢战乱年代的陈文清，从小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直到1948年沈阳解放，他才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陈文清:**我是1934年在大连出生的，那时候的大连和旅顺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子过得很苦。由于家里太穷，我上不了学，就挎着小桶串街卖虾酱。11岁那年，家里送我上了小学，刚念一年，日本投降了，苏联红军开进了大连，因为国民党军队在瓦房店一带封锁交通，严禁米面菜果运输，害得老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饿得实在挺不住，1947年过了五月节，我们全家随着逃难的人走了十几天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沈阳。那年我12岁，家里又送我上小学，念了不到半年家里实在供不起，我就退学进了国民党“联勤”管的汽车修理厂当学徒，转年春节刚过，由工友介绍换到离家近的沈阳麻袋厂当了工人。1948年7月，沈阳市面很乱，工厂也停了工，不知是谁出主意成立护厂队，说要防止坏人钻空子破坏工厂。那时候我还小，对眼前发生的事不大懂，但也跟着师傅们戴上“工人护厂队”的袖标抡着镐把，和大家日夜巡逻保护工厂。11月，20多个解放军军代表进了厂，给我们发新棉衣、新棉鞋，发米和鸡蛋，下了班还教大家唱歌、扭秧歌、搞篮球赛、组织学文化，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舒心。为了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为我们做这些，我每天吃过晚饭就到军代表室，想好好认识这些可亲可敬的人。一个姓王的代表每次见我招呼说，小鬼，进来，挺机灵的嘛，要好好学文化哟！那位韩代表更亲切，她说工人没有文化当不好工厂的主人，让我下了工帮她抬黑板、擦黑板，她好写黑板报。我佩服韩代表有本事，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学会写黑板报。

转眼到了1950年春节。一天，韩代表对我说，小鬼，送你一样东西，原来是矿石收音机。她说，你不光要去夜校学文化，还要知道国家大事，提高觉悟，回宿舍拉根铁丝当天线，广播里有很多新闻大事，要认真听。我端着矿石收音机回到宿舍，几位工友帮我接上天线，戴上耳机拧了拧电位器，有声了！是男声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从此，矿石收音机成了我最重要的物件，直到考上北京广播学院也带着它。有一天，韩代表对我说，小鬼，我和王代表要走了，你帮我们做了不少事，以后你要帮助出板报、搞广播站，要抓紧时间学文化知识，将来有机会搞宣传工作。从第二天起，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两位启蒙我走上广播工作道路的人，听说他们去抗美援朝了。

按军代表的嘱咐，陈文清坚持每星期三个晚上到工人夜校学语文，之后又去沈阳市工会干校、省市电台举行的通讯员训练班学习。1953年，他开始做工会宣传工作。在这期间，他和体育广播有了最初的接触。

**陈文清：**记得是1951年，我用韩代表送给我的那个矿石收音机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转播，是通过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好像是举行篮排球比赛大会。我爱运动，也爱打篮球，听广播里篮球比赛实况解说的时候感觉比赛场面就在眼前，很有神秘感。1953年，我被调到厂工会专职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广播站和文体活动，平时也写点小稿寄给报社、电台。我还参加了通讯员培训班，知道了怎么写稿，也知道了电台是怎么回事。因为经常写稿，我在沈阳业余工人通讯员队伍中有了点名气。我喜欢广播，又负责广播站，曾经很大胆地把广播站的线拉出来，在球场上解说比赛。那时候脑子里没框框，有胆量干这些事儿，即使说得“张冠李戴”引得工友们哄堂大笑也不在乎，这为我以后从事记者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因为努力工作，1959年，厂里推荐陈文清以工农干部的身份参加大学招生考试。考虑到自己对广播的痴迷和喜爱，陈文清报考了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并被录取。

**陈文清：**之前，我们厂已经送了两批人到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本来第一批就有我，但党委说，不行，“小鬼”那儿的工作离不开人，以后有机会再去。到了第二批，又没走成。后来工农速成中学不办了，党委领导觉得有点亏待我，1959年决定以“调干”的身份让我去考大学。当时，距离高考还有半年，党委书记专门找夜校校长给我补课，我只有工人夜校初中语文毕业证书，考大学是“赶鸭子上架”，可是，当工人当干部这些年养成了一个习惯——党叫干啥没二话，要干就要干好它！就这样硬着头皮准备考大学了。记得那年考历史、地理、语文、

政治四门课，工农干部英语免试。因为经常写稿、开会，考政治和语文没问题，但历史和地理考得不太好。报志愿的时候，我想自己在广播站干了那么多年，甭管是不是那块材料，对广播还是很热爱的，第一志愿就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党很眷顾咱工农出身的人，这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来了录取通知书，过去做梦都没有做过的上北京念大学竟然在我的人生征途中出现了！

大学期间，只上过几年夜校的陈文清明显感到了自己在知识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的欠缺，对此，他没有退缩，而是以“笨鸟先飞”这四个字来鞭策和要求自己。

**陈文清：**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可能在知识结构上相差太大，加上文化基础也薄，总觉得许多课的内容听着费劲，跟不上，特别是英语，零分一直伴随着我，即便走路背、晚睡前默念，使了“九牛二虎”之力，测试得3分算顶了天。有段日子我很苦恼，打算给我们厂党委书记写信把我调回去，还干轻车熟路的工会宣传工作。班主任看到我情绪低沉，就找我谈心，说你当工人的时候遇到困难打“退堂鼓”吗？我说，那倒没有。他说，那为什么学习上碰到困难要退缩呢？他给我出了个主意，叫“笨鸟先飞”，说别人休息你少休息或者不休息，别人走一步你得走两步，功夫到了对于课的内容就明白和掌握了。我想了想，觉得自己是笨一点，又是校篮球队的，平时要参加训练和高校间的比赛，学习上就得下功夫挤时间，不能让厂党委和工友们失望。从那儿以后，我养成了积累资料和笔记的习惯，而且干什么都以“笨鸟先飞”这么一个作风和思想要求自己，一直到现在。通过努力和老师、同学的帮助，我慢慢地开窍了，学习有了起色。到了新闻专业课的时候，因为之前有实践，显示出我比只有书本知识、缺乏生活经验同学有优越性，什么编辑课、采访课，对我就是“天高任鸟飞”。工人出身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想敢干，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和私心杂念。1959年开学一个多月，解放军打下美国U2侦察机，同学们欢欣鼓舞，我也来了创作冲动，用三天时间写了个相声《美帝现形记》，登在院刊上。大学第三年夏天，北京特别热，老百姓喜欢吃北冰洋冰棍解暑，我想这冰棍今年会不会脱销？于是就跑到北京食品厂了解情况，写了一篇通讯——《来自冰棍车间的消息》，送到《北京日报》，马上发了。我这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

大学期间，陈文清得到了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部体育组实习的机会。在张之等前辈记者的指导下，他的新闻业务有了很大提高。他吃苦耐劳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也得到了老同志的认可。

**陈文清：**我有过两次实习，有幸都是在中央台体育组，跟着新中国体育比赛现场解说奠基人张之和黄继辰、宋世雄老同志学习。第一次实习，张之老师给我上了一堂关于新闻原则的课，从他那儿，我学到了新闻不能搞虚假，不能以个人

意志代替客观事实，特别是不能违反政策，要做党的喉舌。张之还说，体育是让人们增强体质的，用生动活泼的节目动员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大家有了健康的身体就有了去完成工作任务的“本钱”，也等于我们搞广播宣传工作的人为社会主义建设助了力。实习期间，我做了一个10分钟的节目，叫《中山公园的早晨》。为了做出点儿意境，连续五天，我早晨3点半起床，背着20多斤重的录音机从学校走到中山公园录各种鸟叫声。节目广播后，听众来信打电话说不错，又重播了两次。老同志点评这个节目好在哪儿，又给我上了一堂课堂上没有的现实课。这两次实习让我认识到，搞好工作不能怕苦怕累。从那儿以后，我背着机器到处采访，走多少路、爬多高山、淌多少汗都不怕，冒着翻船危险也要学好端急的翻江倒海的浪声，因为真实的音响是新闻广播节目的生命，这在我思想里牢牢地扎了根。我毕业论文写的是《永远踏踏实实走下去》，说的是干工作要吃苦不能取巧，把全身心献给党的广播事业。

## 二、我第一次进行体育实况解说是在1963年

1963年，大学毕业的陈文清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部体育组，和张之、黄继辰、宋世雄成了同事。

**陈文清：**体育组当时加上我一共有4个人。张之老师是体育组的负责人，他是北京人，早年在青岛一所大学学医，后来投笔从戎随军南下。因为普通话说得好，被留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组副组长。1951年1月，第一次来访的苏联男子篮球队与上海篮球队进行了3场比赛。观众热情很高，门票被一抢而空。没有买到票的观众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提意见，要求电台转播篮球比赛。观众的要求有根据，因为1949年10月1日上海台实况广播了上海群众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游行。上海电台领导觉得这个意见不错，就让喜欢打乒乓球、篮球的张之来解说中苏篮球比赛实况，还找了当时是邮局职员后来成为电影演员的陈述做搭档。因为陈述用业余时间在上海台主持一个叫《邮政信箱》节目，曾经解说过1948年的旧中国全运会，会游泳和踢足球，无稿解说体育赛事，他是第一位。这场中苏篮球友谊赛是新中国实况转播的奠基赛，张之和陈述是新中国体育实况解说的奠基人。这场比赛的实况解说，不仅轰动了上海，也惊动了北京。贺龙听说上海有一个播音员会“说球”，而且让听的人非常高兴，提议请来进行1951年5月举行的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实况解说。张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临回上海，中

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让张之做好准备，说可能要请他加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53年4月，张之被正式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候，电台还没成立体育组，就让他暂时待在时政组，主要负责体育采访。黄继辰老师是1953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中央台的，也在时政组同张之搭档负责采访时政和体育新闻。1955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了《体育谈话》节目，这是新中国广播史上的第一个体育广播栏目，这个栏目在1957年更名为《体育运动节目》，1958年简化为《体育运动》。最开始是一周两次，一次10分钟，后来增加到一周3次，每次20分钟。1959年，体育组成立了，隶属于文教部，张之老师是负责人。次年5月，宋世雄进到体育组，当时他高中刚刚毕业。五六十年代，体育组的工作主要有两块儿，一块是《体育运动》节目，一块是赛事实况转播。《体育运动》节目里有新闻和通讯，其中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报道占很大比重。当时，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规定了新中国的体育方向——体育要面向群众。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服务，工厂、农村、学校、部队、街道群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活动。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张之老师提出，体育组的4个人除了做《体育运动》节目之外，都要学习和掌握体育比赛的实况解说工作。我生在大连，长在沈阳，口音很不正，特别是平翘舌音不分，虽然在广播学院有语言课，自己也下功夫克服东北的“海蛎子”味儿，但毕竟是近30岁的人了，纠正起来很难。但是，张之老师对我毫不放松，他说，你不把错误的语音改了，不要说实况解说，搞体育报道都难合格。批评得很严厉，让我直出冷汗。我想，上大学攻学问，“七十二拜”都过了，还能让字不准音不正给难倒？于是，每天早起上河边喊嗓子，反复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连上街走路、骑自行车的时候都看到什么说什么，特别注意克服“四十”不分、“事似”不分的毛病。练到迷的程度是广播工作的需要，张之老师多次说，“当初我就是这么练的”。

为了让记者全面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位体育记者都要参与体育实况解说，陈文清也不例外。1963年底，经过半年的学习和训练，陈文清第一次坐在了体育实况解说的话筒前。

**陈文清：**张之老师的观点是，体育记者要编、采、播全面发展，特别是能胜任体育实况解说。为了适应工作需要，除了日常的编辑采访和值班录制节目，我们体育组4个人分两摊儿——张之和我，宋世雄和黄继辰，有体育比赛实况转播解说任务的时候，上一个“强”的，搭配一个“弱”的。比如一场篮球赛或者一场足球赛，上半场我解说，下半场张之老师说，或是黄继辰老师负责上半场，宋世雄解说下半场。这样安排，是由于上半场比赛的双方为下半场获胜做“铺垫”，

争夺不会那么激烈，比赛的高潮也不会那么频繁，所以，解说员不那么紧张。而下半场比赛决定胜负，争夺得很激烈，高潮场面一个接一个，要求解说员不仅跟上比赛节奏，还要评述，而且要评到“点子”上，语言必须精练，我们称它为“帽戏”和“压轴戏”。实践证明，这样安排，听众欢迎，广播效果很好。

有这样一种情况，比赛中间解说员要去厕所或者喝水怎么办？就让旁边“助手”接着说，主播解说员稍事休息，定了神再接着说。如果是重要比赛，有邓小平、贺龙、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看比赛，一律由张之或宋世雄解说，他们要全神贯注，即便想方便也要憋着把比赛解说完成。为了完成任务，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准备了比赛解说用的各种资料后，比赛当天要好好睡午觉，晚饭吃半饱，坐到话筒前少喝水，把一切“打扫”干净，以便不受干扰、情绪饱满地进入解说境界。

我们四个人虽说是分两摊儿，但还要合作，就是不上解说的人要把现场比赛的资料准备好，记好比赛场上比分变化、犯规等各种情况并提供给解说员，使比赛的解说准确而生动，同时要监听解说员的评论语气、用词、技战术的介绍及背景材料的运用，发现说得不准确或用词不当，马上提醒纠正，因为解说员全神贯注，助手“旁观者清”。另外，绝对不碰及政策性、敏感性问题，使解说沿着比赛的轨迹走而“不出格”。

随着广大体育爱好者欣赏水平的提高，张之老师提出请专家参与解说。因为在技术上我们说得浅薄，有时说外行话或出笑话，而专家当顾问会评述得准确、简练、深刻。这个做法在“文革”以前就采用了，年维泗、袁伟民、李富荣等著名教练和专家都当过中央台重大或精彩比赛的解说顾问，他们画龙点睛的评述，为中央台体育比赛实况转播增了光、添了彩。

我第一次进行体育实况解说是在1963年刚到中央台体育组工作几个月之后。我这个人躺下就睡着，一般不失眠，当决定让我解说上半场篮球比赛实况之后，那几天晚上睡得不踏实了。我明白这是张老师给我磨炼的机会，也很想让老师“挑剔”，得到指点，长点本事。“丑媳妇也得见公婆”，我就在话筒前放开说。老规矩，像在大学模仿张之老师播音那样，那几天嘴里不断叨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向您转播……今天双方出场的队员有……”。足球、篮球、乒乓球比赛的场面变化极快，解说一定要跟上。我在解说中出于把准备好的材料说出去或要交代一个精彩技术配合的想法，有时跟不上比赛的场面，一跟不上就急，一急一身汗，半场解说下来后背都湿透了。当时心里想，解说工作要头脑敏捷反应快，既要针对现场交代技术特点，要说得简练形象，还要有展望和评论，太难了，可能我不是这块“材料”。张之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不仅不说

让我“下课”，反而点出我思想有波动的要害。他说，解说员一要有责任心；二要有勇气；三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丰富语言；四要把小说、电影中的精彩语句、老百姓精练形象的语言学习借鉴后，运用到解说中去。只要认真琢磨，认准了的事好好干，摸到规律，慢慢就会形成自己的解说风格。就这样，我常给张老师、宋世雄打下手，他们累了我就上。

从1963年开始，陈文清开始全面参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报道。其中，1965年的第二届全运会和1966年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报道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陈文清：**第二届全运会，全国上下比较重视，那时候电视还没怎么发展，群众主要靠广播了解体育信息。全运会的时候，我们这边除了《体育节目》，晚上设置了半小时的《第二届全运会特别节目》，还转播了开幕式和举重、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等比赛实况。1966年，我们去柬埔寨报道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西哈努克亲王很热情，跟每个中国运动员和记者握手。那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力度很大，派了六七个人去柬埔寨，其中体育组去了三个人，这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说是历史性的。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类型的比赛报道，心情挺紧张。领导让我报道开幕式和入场式，那时候思想不够解放，不敢搞直播，决定搞一个比较长的录音报道。为了精练，我拣重要的说，概括了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特点、中国代表团的风貌等，算是顺利完成了任务。当时，张之老师和宋世雄留在后方，要编、播我们传过来的稿子和音响，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能和现在比，而且各种规定和政策要求挺严，又必须把这届运动会报道好，因此他们的工作压力很大。

“文革”开始以后，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比赛停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运动》节目取消，体育组和其他组合并为《对工人广播》节目组，体育比赛实况广播也暂时中断。到1970年，中国开始恢复国际体育交往和体育比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报道重新打开了局面：1970年，恢复赛事实况广播和体育组建制；1972年，恢复体育专题节目。

**陈文清：**1967年，体委被砸烂了，体育节目当然也没了，体育组这些人都转行去做工业报道了。1970年7月，为了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中国政府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体育表演赛，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体育实况转播，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体育实况转播。8月，朝鲜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进行友谊赛。因为有周总理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同时转播了友谊赛实况。转播之前，传达上级精神，说是“友

谊第一，比赛第二”，要把场内的友谊气氛说够说透，但是不准报比分，说报比分是锦标主义至上。在开实况比赛转播筹备会的时候（这是体育组的惯例），我说，体育比赛上，报比分、决胜负是规律，不报比分总说“好球！”“把球捞了起来，对方回球下网”，这叫体育比赛实况解说么？让我去转播，没准就报了比分，这是大脑和嘴的自然反应。张之老师说，上级的指示是衡量了各种情况后定出来的，中朝乒乓球友谊赛实况转播是停了这么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要按上级的精神完成。大家提了很多不报比分的解说办法，最后还是由张之老师完成了这次解说。领导表扬说不错。通过这次转播，我更敬佩张之老师了，他不仅把握了政策，没露出双方的比分和胜负，还把比赛解说得精彩起伏。然而，后来总结、回顾这一段工作的时候发现，是大家错误地理解了周总理的指示。周总理说，体育是一种文化交流、感情交流，不要把胜负看得那么重，要通过比赛达到增进友谊的目的，所以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结果，大家以为“友谊第一”就是不报比分，完全同总理的指示弄拧了。

在朝鲜乒乓球队来访之后不久，体育组恢复了，还是我们最初那四个人。那时候的台长是杨兆麟，他以前是时政组组长、国际部主任，一直很关心体育报道和实况转播，多次随我们去北京几个体育馆，坐在实况解说员旁边，提醒把住政策关，用好用准比赛的技术分析和解说语言。

1971年名古屋世乒赛，因为外汇紧张，我们中央台没派人去日本采访。为了报道中国运动员在这届世乒赛的表现，中央台特派老黄（黄继辰）到新华社去看人家记者从日本发的中文稿和英文稿。新华社的信息来得快，老黄看了前方发的有待编辑的稿子，先快速编出一条条简讯，用电话传到中央台及时广播。当然，播这些新闻要先报“新华社刚刚发来的消息”。新华社也高兴，这样广播要比第二天各报纸刊发快得多，认为合作很成功。后来，凡是遇到包括世界杯足球赛等国际性大型比赛，老黄都不分昼夜去新华社充当“尖兵”，用电话传编好的稿，快速向全国人民报告。

1977年，我出国采访了在英国举行的第34届世乒赛，发新闻、传现场报道和最后的决赛实况转播，我一个人全干了。

继1970年恢复体育组建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报道组在80年代发生了一些变化：1984年底，体育组从文教部划归新闻中心；1986年10月，体育组升格为体育部，依然隶属于新闻中心。在此期间，宋世雄、黄继辰分别去了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与此同时一些年轻同志加入进来。

**陈文清：**70年代末，我们这儿来了几个新同志，像刘宝成、杨世龙、焦金英、



宋竞先，80年代初，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张琳、陈建奇和梁悦也来了，还有因为嗓子不适应播音要求下到部门的播音员向东等。1986年，体育组扩大为体育部，就又增加了一些新人。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1979年中国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中国参与的世界性比赛逐渐多了起来，由此中央台也经常有机会派人出国采访、报道、进行体育实况转播了。“文革”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新派人出去采访是198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女子排球世界杯赛，就是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的那一次，那是中国体育腾飞的一个起点。那次是宋世雄和张之老师去的日本，我和黄继辰在后方。平时我们四个人各有采访报道项目，女排报道由宋世雄负责，我主要负责举重、足球等项，但出国采访就不分项目了，统一调配、集中报道。那些年，我出国采访的次数比较多，主要是足球、游泳、体操、乒乓球、羽毛球以及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亚运会这些中国运动员能获得优异成绩的比赛。出国采访的时候，我不仅要兼顾多个项目，还每天几次往北京发消息和实况录音报道。在只能用电话向国内进行比赛现场解说的情况下，我也敢于实践。中央台体育部通常是根据报道任务的强度、节目设置的长短、能否完成任务，决定派出人数和人选。

中央台的现场录音报道，可能是从我这儿开始搞起来的。拿着话筒录下比赛现场或是群众进行体育活动的实况音响，再经过剪辑播出，可以充分发挥广播快速和真实的特点，比起比赛新闻稿更生动，听众爱听。在我得过的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一、二等奖等20多个奖项中，现场报道屡屡“命中”，因为得到了评委的欣赏嘛。

20世纪80年代是体育广播的辉煌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节目》是听众最快了解中国运动员比赛情况的重要渠道，因而大受欢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3年的听众收听率抽样调查和1984年的听众评选中，《体育节目》均排在第三位，仅次于中央台的《新闻报纸摘要》和《全国联播》。199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创办了体育谈话节目《体育沙龙》，这让人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陈文清：**1981年女排第一次夺冠以后，听《体育节目》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说，在电视大发展之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大家获取体育信息的主要渠道。凡是爱好体育的人，没有不知道《体育节目》的。1983年以后，电视逐渐有了规模和优势，但《体育节目》仍然在人们心目中占很重要的位置。

90年代以后，我们也在谋求节目的改进，改进就需要创新。1994年，我们推